

关于传统中国地权问题的研究

——与刘志讨论

赵安冬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40)

【摘要】针对刘志论文对曹树基先生的批评,本文从产权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传统中国的地权结构。本文认为,刘志理解的“地权”和“一田二主”没有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也没有社会科学的意义。刘对曹树基先生的批评存在二手文献的局限、方法论上的不足,不是基于实证的分析,没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地权;一田二主;二手文献;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0)02-0065-07

Study on the Issu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and Rights

——A Discussion with Liu Zhi

ZHAO An-dong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Liu Zhi's criticism of Mr. Cao Shuji,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tructure of the land right in traditional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perty rights theory. 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Liu Zhi's understanding of "land right" and "one field two owners" does not respect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predecessors and has no social science significance. Liu Zhi's criticism of Mr. Cao Shuji has the limitations of second-hand literature and methodological deficiencies, which is not based on empirical analysis and has no reference value.

Key words: land rights; one field two owners; second-hand literature; methodology

传统中国地权问题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主要命题之一。2015年,曹树基、刘诗古出版《传统中国地权结构及其演变》一书^①,以实证分析的方法呈现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地权结构及变化特征。2017年刘志发表《地权的分割、转移及其阐释——基于传统中国民间土地市场》^②一文,批评曹树基等提出的地租、押金与利率的产权模型和对“地权分割”的理解。2018年曹树基先生专文回应其误读与批评^③。刘志又以《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④为主要材料,再次撰文讨论地权问题,并对曹氏回应提出批评(以下简称刘文)。针对刘文的“发现”,以及其方法论上的不足,本文试作分析如下。

[收稿日期] 2020-03-02

[作者简介] 赵安冬(1991-),男,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农村社会调查。

① 曹树基、刘诗古:《传统中国地权结构及其演变》(修订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

② 刘志:《地权的分割、转移及其阐释——基于传统中国民间土地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3期。

③ 曹树基:《传统中国地权问题再讨论——对刘志相关批评的回应》,《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5期。

④ 前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编:《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

一、何为“地权分割”与“一田二主”

刘文将押租、典形成的“广义的一田二主”和“一般的一田二主”之不同当作自己的“发现”，并总结前者为“非永久彻底的地权分割”，后者为“永久彻底的地权分割”，以示区别。

“地权分割”即“田底权”、“田面权”之分割。刘文理解的“广义上的一田二主”是“田底权”、“田面权”未分割彻底、永久，却从属二主。“一般的一田二主”即“田底权”、“田面权”分割明确，互相独立，也从属二主。所以，刘文将“地权”当作是“田底权”和“田面权”的集合体（下文简称“田底面权”），“地权分割”即对“田底面权”的分割。

这一分析似乎没有错，但其所称的“分割彻底”或“永久”则是相当含糊的判断，他自己把握不住，旁人也难以理解。曹树基采用“权利束”^①的概念，认为一块土地分割为田底、田面之后，田底主与田面主共同享有处置权和收益权，田面主拥有使用权。很显然，曹氏的分析清晰明了。

刘文认为，“押租”与“典”导致了田底、田面的不彻底分离与田底、田面彻底分离的“一般的一田二主”存在联系和区别。曹树基认为，“押租”与“典”是“地权”分化的不同阶段和形态，也是“一田二主”的不同阶段。刘文对“一田二主”的定义是基于“田底面权”而言，而曹树基对“一田二主”的定义是基于产权“权利束”的分析。在传统乡村，至少拥有土地处置权（或部分处置权）的主体才能称得上“一主”，这种共有土地处置权的现象称为“一田二主”，甚至可以发展出“一田数主”。

“一般的一田二主”也不是刘文之发现。1946年日本学者仁井田陞指出：

把同一地块分为上下两层，上地（称田皮、田面等）与底地（称为田根、田骨等）分属不同人所有，这种习惯上的权利关系就是“一田二主”。田面权（上地上的权利）与田底权（底地上的权利）并列，也是一个永久性的独立物权。底地所有人的权利，是每年可以从享有土地使用收益权的上地所有人那里收租（固定的得利），但是欠租一般不成为解约原因。而且上地、底地的所有人，各自处分其土地时，互相间没有任何牵制。^②

这与刘文“一般的一田二主”的概念别无二致。两者都将“田底”“田面”看作是两份独立的不动产，是一种完整的物权，忽略了田底、田面基于同一块土地，田底主和田面主是该土地利益共同体的关系。

杨国桢先生亦提出过“初级形态的一田两主”和“完备形态的一田两主”的概念。“初级形态的一田两主”即垦荒佃户对“田底”尚无充分的所有权，不能自由转让；“完备形态的一田两主”即佃户不必经业主认可，可自由转卖；佃户对“田底”享有充分的所有权，可以随意处分^③。杨氏证明了在形成“田面权”的过程中存在着的不同的复杂阶段，田底与田面之间存在各种中间形态。刘文则进行了各种“中间形态”与“终极形态”之比较^④。

不仅如此，杨氏还对田面主对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和部分收益权、处分权的权能试作分析，并列举出明清福建田主不同交易状态下的权利分割。总结为表1：

① 欧中坦：《消失的隐喻：运用西方法学学术知识研究早期近代中国契约与产权的分析》，载曾小萍、欧中坦、加德编：《早期近代中国的契约与产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2页。

② [日]仁井田陞：《明清时代的一田两主习惯及其成立》，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8卷，中华书局，1992年。

③ 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8页。

④ 刘志：《地权的分割、转移及其阐释——基于传统中国民间土地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3期第34页表3。

表 1 明清福建田主土地所有权的分割状态

交易俗名	交易内容	原田主权利	买主、典主或佃户权利
活卖	活卖田面,保留田底	部分收益权	占有、使用权、部分收益权
虚悬	活卖土地	法律上的所有权	
佃户成田面主	垦荒代种	田底权	田面权
单卖田面	单独出卖田面	田底权(并耕种)	田面主
割粮差	卖田底	田面权	田底权
诡寄	诡寄土地所有权	田面权	
授产	赠所有权、粮差	田面权	田底权
卖田底、田面	卖田底田面给二人	无	田底权或田面权

资料来源:杨国桢《明清福建土地私人所有权内结构的研究》,收入傅衣凌、杨国桢主编:《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

在这一分析中,占有权、所有权、收益权、使用权与田底权、田面权混用,缺乏概念上的清晰性与一致性。我们的分析只采用处置权、收益权和使用权这一组概念,就能达到清晰解释的目的。删繁就简,应当是学者追求的目标。

在更早的民国农村调查中,刘文“田底面权”的分割就被实践。陈翰笙、王寅生在 1929 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无锡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英文本)中将地权的转移总结为四个阶段:

典出田底权→绝卖田底权→典出田面权→绝卖田面权^①

在无锡当地还存在“死契”“活契”“死头”“活尾”之称。简而言之,“死契”为绝卖之契,“活契”为活卖之契。“死契”、“活契”的对象可以是田底、田面或整块自田。所谓“头”“尾”分别代表的是田底和田面^②。

“死头活尾”即自田主绝卖田底,活卖田面的情形。到了 1943 年的山东解放区,薛暮桥主持土地工作,建议将“活尾”也就是添价除去,对田面亦绝卖,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绝契”^③。这不正是刘文阐述的“田底面权”非永久彻底分割到永久彻底分割的过程吗?当然,在 1929 年无锡调查中,还存在更为复杂的“十二种地权”形态^④,并非刘文“永久与非永久”“彻底与非彻底”所能概括的。

基于“权利束”的分析,我们认可的“地权分割”是对土地产权的分割^⑤。刘文的“地权分割”是传统乡村习惯中“田底面权”的分割。在传统乡村,并没有“产权”的概念,“田底”和“田面”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产权”。刘文与前人一样,将“传统

表 2 传统中国地权结构的产权分析 (乙方)		买卖	典	押租
自田	收益权	○	○	△
	处置权	○	△	△
	使用权	○	○	○
田面田	收益权	○	○	△
	处置权	○	△	△
	使用权	○	○	○
田底田	收益权	○	○	
	处置权	○	△	

说明:1.○为全部权利;△为部分权利。
2.原田主为甲方,承买者、承典者与交纳押租者为乙方。

① Wong Yin-seng, ChienTsen-jui and others: Land Concentration in Wusih near Shanghai, in *Agrarian China: Selected Source Materials from Chinese Author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38, PP.5-10.
② 华洪涛:《调查与报告:无锡一隅之农村概况》,《教育与民众》1932年第3卷第7期。
③ 薛暮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0页。
④ 详见笔者:《陈翰笙与1929年无锡调查中的地权问题》,待刊。
⑤ 何维达、杨仕辉:《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54页。

地权”中的“田底”“田面”当成单独的事物,而不是一个“权利束”。基于传统中国特殊的土地结构,我们将“传统地权”分解为①田面的收益权;②田面的处置权;③田面的使用权;④田底的收益权;⑤田底的处置权。对“自田”^①产权则分解为①土地的收益权;②土地的处置权;③土地的使用权。因此,传统中国各种土地交易方式、“地权分割”形态实质上是“权利束”的让渡与分割(见表2)。

此外,“普通租佃”之佃户没有土地处置权,不算“一主”。他们只有租佃期限内的土地使用权和部分收益权。

如此,一块土地在理论上可以形成“一田数主”的现象。如自田主A分别将田底、田面出典给B和C。C自己耕种,或招丁佃种。这样一来,A和B共享田底的处置权,A和C共享田面处置权。这块田地上,就有A、B、C三个产权意义上的“主人”。当然,还有更多复杂的理论上的组合。

二、二手文献的局限

刘志主要引用的是民事习惯调查报告之类文献。这些调查是由各地不同的调查员,在不同的时间进行的。各地调查员对于当地的地权制度,或理解准确,或存在偏差。如果不对此类文献作深入的研究,也不与契约文书之类的一手文献配合比较,则难免出现理解上的误差。

如刘文将安徽英山县“羈庄”当作预租和承包,其实仍是押租。押租到期后,押金可退或不退。“羈庄银”在安徽农村并不特殊。《安徽省农村调查》记载:

一般民田,大部均有押板(或叫羈庄),但无永佃权,只有坟地及少数分租地无押板金。^②

押板金,又称寄庄费或租田礼。佃户在承租时,写上领纸,言明期限(十年为一庄,五年为半庄)、租率、章规,加上押板金,交给地主,才能“上庄”承租^③。

还可见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藏刑部档案抄件与《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

(安徽霍邱,嘉庆十四年)胡自清凭中说合,佃种陈陶水田两石,交有寄庄钱十三千文、写礼钱十四千五百文。言明每年租稞八石,给种三年。如未满足年限,陈陶辞佃,仍照原数还钱。^④

各乡农民自耕者颇少,佃耕者最多。佃田办法,一为须纳“押板金”(即押租)者,名曰“保庄”,不纳者曰“清庄”。^⑤

在《中国经济年鉴》中,安徽押租也有“顶首”“羈庄”“基脚”“讨田礼”的俗称^⑥。

如刘文认为无锡存在押租和田面价之混淆,其实不然。1930年《第一回无锡年鉴》载:“(第二区)土地买卖价格,田面30元至60元,田底60元至120元。”^⑦1950年代的无锡农村调查可以验证。(战前)无锡坊前乡农民迫于生活,出卖田底于地主,每亩约值白米10石。抗战期间,无锡农村田底价格一落而为4石白米上下(每亩)^⑧。1929年,无锡米价约合10元每石^⑨。如此,战前无锡田底每亩价格应在100元左右

① 田底、田面未分化,产权完整之田,自耕的自田主可享有土地全部的处置权、收益权和使用权。

②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安徽省农村调查》,内部刊行本,1952年,第49页。

③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安徽省农村调查》,内部刊行本,1952年,第85页。

④ 转引自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1840-1911),三联书店,1957年,第77页。

⑤ 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安徽省·宿松太湖两县》,黎明书局,1935年,第91页。

⑥ 民国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经济年鉴:1934-1936》第3册第7章《租佃制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480页。

⑦ 《无锡县分区调查表》,载无锡县政府、无锡市政筹备处:《第一回无锡年鉴·政治》,编者刊,1930年,第47页。

⑧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内部刊行本,1952年,第119、73页。

⑨ 社会经济调查所编:《无锡米市调查》,《粮食调查丛刊》1930年第8期。

右,战后跌落至40元左右,与《无锡年鉴》相符。而1948年,无锡县地籍整理办事处调查全县租佃制度,其中礼社所在的玉祁自治实验乡有押租的比例占30%,每亩押租额为3斗米,合3元每亩^①。与30元每亩的田面价相去甚远。不存在“并非严格分开”之事实。

如刘文认为江西“顶耕”是押租而不是田面价,其地权结构与“一般的一田二主”无异。《西江政要》卷1载:

耕佃山田宜明立佃约也,查江西省田土半皆山麓……始则向田主佃田,佃以现银数两,名曰退价,又曰顶耕,必令业主写立退字付执,业主贪得目前微利,受其圈套,继则多贪退价,将田私佃他人,竟有以一主之田,分佃至数十人,甚有任意典卖,得价回籍者^②。

其中,“退”是一种不完整产权的转让形式^③。“田主”即田底主,“业主”即原田面主。佃户向业主交纳“退价”实际上完成了田面的转让,成为新的田面主。因此,该“佃户”转佃或典卖田面符合民间习惯。但“田底”、“田面”并不为江西布政司所认可,甚至要革除这一“积习”^④。

江西宁都县古溪村的“顶退田契”也记载了类似的习惯:

(咸丰八年十二月)立顶退田字人古溪村李启珍,原有父手分授萧宅水田乙户,计租叁担柒斗叁升叁合伍勺……今得说合引至到本家家富珍兄弟承退耕作。当日面议,得到时值退价铜钱贰拾壹两正。即日交付明白,不少分文……自退之后,任凭承退人过手耕作为业,出退人不异说^⑤。

该水田田底主为萧宅,原田面主李启珍因急用钱,将田面转让给家富、家珍兄弟,获得一笔“退价”(田面价)。家富、家珍成为新的田面主,可任意处置田面。也就是说,清代江西田底、田面分化已趋明显,转让田面现象普遍。“顶耕”、“退价”已是田面的买价,但田面主的存在影响了赋税的征收,所以受到官府打击。

刘文又认为崇明的“圩田”佃户是田面主,出售的是田面价。查民国《崇明县志》卷6:

地有买价、承价之名,盖一田两租也。买价者,三年丈拨。虽浪底水涂,即责里排赔粮亩五合,待淤泥淤积渐高,按则升课。圩田之日,赔赋已多,名曰恩拨,实同价买……故曰买价。

承价者,承田主之付托,代负筑圩开生之价也……如不能自圩,召佃挑筑……田主皆宜偿还,若无力清偿,遂于已产买价内设一价名,以抵偿之,曰承价。田主给佃批书,佃给田主承管券,永为世守。其例主佃各半者曰半承价……若佃户独得者,曰全承价……若论产权仍以买价为主,非承价另有一产也^⑥。

在崇明,涨沙未成耕地之前,政府即开征赋税,并承认税粮(即买价)的长期承担者为法律意义上的“田主”。田主招佃开垦后,只有无力清偿佃户开垦成本时,佃户才能取得“全承价”(田面),但“买价”田主仍然是官方意义上的田主。实际中,田主清偿比例不一。所以,崇明圩田佃户并不一定是田面主,也不能视为刘文的“一般的一田二主”。

① 严保滋:《无锡县地籍整理办事处两周年纪念特刊·调查》,无锡县地籍整理办事处,1948年,第11页。

② 《西江政要》卷1:《严禁佃户私佃并侵占报垦》,转引自仁井田陞:《明清时代的一田两主习惯及其成立》,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8卷,中华书局,1992年,第453页。

③ 曹树基、李楠、龚启圣:《“残缺产权”之转让:石仓“退契”研究(1728-1949)》,《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④ [日]仁井田陞:《明清时代的一田两主习惯及其成立》,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8卷,中华书局,1992年,第411页。

⑤ 曹树基、陈文平主编:《客家珍稀文书丛刊(第1辑)》第45卷《咸丰八年十二月李启珍立顶退田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12页。

⑥ 民国《崇明县志》卷6《田制》,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266-267页。

与“圩田”类似,“崇划田”也是江中新涨之田,属南通者称“通划田”,属崇明者为“崇划田”^①。但“崇划田”代表了一种“田面”,并不是押租。其中,业户拥有底权,佃户向业户交纳每亩30-80元不等的“顶首”,再加上垦生工本,实际上获得了“田面”,可以转佃,也可以出卖。而崇明的押租称“预租”。佃户不交顶首(田面价),只“预付”租金即可承种,每亩押金在5~7.5元之间^②。

刘文认为松江的“顶首”或为押租,或为田面价。其实,押租与田面价的标准,可以通过契约文书中的相关价格来判定。刑炳彦引用了松江“典于记”的一份“认田契”,其中一份“副度”^③载:

(民国四年四月廿二日)佃户钱桂泉承种本仓坐落青邑三十八保二区廿六七图服字圩内毛田拾肆亩五分,正租拾肆石五升,当收顶首洋叁拾元正。倘后亏欠租米,即将顶首扣算清讫,听凭收田,另召良佃接种^④。

“佃户”钱桂泉向“典于记”交纳“顶首洋”30元正,获得一块面积为14.5亩的圩田耕种权,钱氏每年向“典于记”交纳“正租”14.5石。每亩平均“顶首”价格2.1元,大大低于上文所引无锡田面价30-60元的水平。“顶首”是押租还是“田面”,通过契约文书的分析即可明了。如果只依据《民事习惯调查》,则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刘文认为薛暮桥《广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混淆了“田底”和“田面”的概念,而实际是《解放前的中国农村》和《薛暮桥文集》错将“活卖田地”刊成“活卖田底”:

土地典当。实际就是活卖田底。它同抵押制度不同,因为后者按照借款数额偿付利息,前者按照土地数额偿付地租,实际已从借贷关系变成租佃关系。^⑤

1934年6月25日,这份报告由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农村经济研究会出版,并成为作者在该校《农村问题》课程的讲稿;后经修改补充,编为《中国农村经济常识》,1937年1月由新知书店出版。其中有更进一步的阐述:

典当同抵押不同之点,就在后者(抵押)采用借贷方式,负债农民按期支付利息;前者(典当)却要暂时转移地权,负债农民不付利息,按期缴纳佃租。典当土地所出代价,普通常在购买土地所出代价的半数或是三分之一上下。^⑥

可见,薛暮桥要表达的“土地典当”就是“活卖田地”。出典后,承典人拥有土地全部收益权、使用权和部分处置权,出典人保留部分处置权。特殊之处在于,出典人仍然耕种土地,成为承典者的佃户。地租就是典价的利息。

三、方法论之分歧

“一田二主”现象之所以引发长久的讨论和争鸣,是因为其形态多样、习俗各异,难以找到合适的分

① 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经济卷下》,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667页。

② 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经济卷下》,第668页。

③ 地主收到佃户交纳“顶首”后给予佃户的凭据。

④ 转引自邢丙彦:《清末民国时期松江的土地租佃费用变化——上海市档案馆藏近代松江土地租佃契约文书研究之一》,《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1期,2009年,第103页。

⑤ 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第619页;薛暮桥、刘端生:《一九三四年广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载《薛暮桥文集》第15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第26页。其中,《薛暮桥文集》收录了《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中的广西报告一文。

⑥ 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第9章《中国农村中的高利贷》,新知书店,1937年,第99页。

析框架。刘文对于不同地区《民事习惯调查》的理解,多采取“永久与非永久”“彻底与非彻底”的判断,不仅没有走出前人的讨论视角和研究思路,更称不上简洁、清晰与科学。

前人采用并一直讨论的“永佃”概念实际上起源于罗马的“公田占有制度”(possessio del ager publicus),其后扩展到私人田地,成为一种可以转让的并可转移给继承人的物权^①。然而在传统中国乡村的契约文书中,并没有“永佃”一词,更没有“永佃权”,只有“永远耕种”等固定的契约格式。前人的研究或将“田面”当成“永佃”,或将“永佃”当成一种“所有权”。杨国桢虽然也采用了“永佃”的概念,但其从契约文书中,认识到“永佃”不是“田面。”^②樊树志、刘克祥等仍就“永佃”的起源、发展和特征进行了讨论^③。

归根结底,“永佃”“永远耕作”等都是对“地权”时间性的定义,不是精准的产权概念,也不适用于科学的定量分析,因此才被最近的研究所摒弃。

近十多年来,曹树基等深耕于石仓契约、客家文书、江津档案等地方文献的研究。首先突破“永佃权”“所有权”等概念桎梏,改用“权利束”这一简洁、科学的分析框架。在总结一个区域的研究基础上,再对全国其他地区进行验证。其中“地租—押金—利率”的产权模型^④将普通租佃、押租、田底、田面与典等传统概念纳入到社会科学的定量分析框架。最近他对福建《永春文书》的研究,推算出当地“典租”的平均年利率在12.6%左右,颠覆了传统调查乡村借贷利率在20%~30%之间的一般观念^⑤。

这种回到“一手文献”和“历史现场”,采用实证分析的“科学主义”与刘文紧跟不同调查员的总结分析,进行复杂、模糊的概念推演的“人文主义”形成方法论上的分野。刘文图1中“田面不被出卖”“不得出卖田面”“可以退佃”“允许佃户退佃”正是对田面处置权的解释。图2中“占有部分地租”“佃户可卖田面”“佃户可转佃”又是对土地收益权和处置权的解释。刘文之“永佃押租”亦是对传统概念的进一步模糊化。

实际上,1929年陈翰笙、王寅生的无锡农村调查已是十分标准的社会科学方法^⑥。每户一册的《江苏无锡农民地主经济调查表》详细记录了每种田权的亩数、亩产、租额、田价、地权性质和交易方式^⑦。在调查报告(英文本)中,陈氏又对各种数据进行了汇总计算,分析出无锡地权的分配情况^⑧。只是由于革命实践的历史背景,无锡调查报告并不是严格的学术研究成果。今天社会科学的经济史研究正是对这一方法的继承和延续。

纵观全文,刘志与曹树基存在两方面的分歧。其一,刘志认为的“地权”是传统时期“田底权”与“田面权”的集合(田底面权)，“地权分割”即“田底面权”的分割。而曹氏分析的“地权”则是产权理论的“权利束”，“地权分割”亦即“权利束”的分解；其二，刘志理解的两种“一田二主”是田底主和田面主对田底、田面分割的彻底与不彻底，永久与非永久，曹氏的“一田二主”是田底主与田面主共同享有“处置权”。

在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契约文书作为“一手文献”,比《民事习惯调查》这样的“二手文献”更具说服力。随着契约文书的大量发现,研究者理应更多地采用“一手文献”从事地权研究,其结果要比采用二手文献好得多。

① [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16-219页。

② 杨国桢:《论中国永佃权的基本特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③ 樊树志:《明清租佃契约关系的发展——关于土地所有权分割的考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刘克祥:《中国永佃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赵冈:《永佃制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

④ 曹树基、刘诗古:《传统中国地权结构及其演变》(修订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

⑤ 曹树基:《典地与典租:清代闽南地区的土地市场与金融市场》,《清史研究》2019年第4期。

⑥ 第一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被认为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国立劳动大学劳动季刊》1931年创刊号,第1-10页。

⑦ 调查表原稿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江苏省无锡博物院。

⑧ Wong Yin-seng, Chien Tsen-jui and others: Land Concentration in Wusih near Shanghai, in *Agrarian China: Selected Source Materials from Chinese Author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38, PP.5-10.